

书评

破解苏联帝国衰亡的奥秘

——读张建华教授的《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

李随安

【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95-1094(2017)03-0094-0003

2016年是张建华教授的学术丰收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1936—1991）》。前者是断代史样式，选择1762—1855年这一历史时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多方面入手，破解俄罗斯帝国崛起的奥秘；后者是专题史样式，特别选择1936—1991年这一历史时期，目的在于通过透视苏联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云谲波诡，破解苏联这个红色帝国衰亡的奥秘。两部著作彼此呼应，相映成趣。

1991年苏联解体犹如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26年，国内外探索苏联解体的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张建华教授的这部著作独辟蹊径，从苏联知识分子命运、苏联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苏联衰亡的原因。

—

为什么选择1936—1991年这一时段？应该从张建华教授此前的另一部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说起。

在此书中，作者认为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20世纪20—30年代中期既是苏维埃政权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并且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精神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他们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这本书从新政治史和政治学视角出发，探究了苏维埃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亲近—间离关系；从新社会史和社会学视角出发，勾画了从俄国向苏联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维度与政治表达方式以及该群体的经济生态与日常生活；从新文化史和思想史视角出发，以个案研究方式，分析了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司徒卢威、米留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人从白银时代的“知识精英”向不同阵营的“政治精英”进行角色转换的历程。

而在《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1936—1991）》中，作者解释说，1936年是苏联国家进程与政治进程的转折性一年，这一年，苏联进入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殊印记的时期。

苏联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高

【作者简介】李随安，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于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对社会有独特的思考，感觉敏锐，是苏联政治变迁的亲历者和观察者，更是映照这个帝国多面特质的棱镜。在这部著作里，作者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苏联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作为研究主线，剖析这个特殊群体的悲剧命运与苏联解体的关联。

苏联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是极为特殊的，他们既是苏联文化体制的建设者，同时也是此体制的受制者。在这个文化体制中运行着法力无边的出版检查制度，严苛的检查操控作品乃至作者的命运，知识分子耗尽心血创作的作品要经过层层检查才能发表。在苏联特殊体制下，其新闻出版业高度集中、高度封闭，舆论高度统一化。掌管苏联文化体制的是苏联的意识形态部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它按照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决议进行一波接一波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长期（1966—1982年）主管苏共中央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被戏称为“红衣主教”。

苏联知识分子还受制于特殊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是苏联的强力机构，其职能之一是对知识界人士实施监控、规训和惩戒。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之中借助第一手历史文献进行了研究。

在苏联的文化环境里，领袖意志决定一切。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控制一度有所放松；战争结束后，在他的支持下，发起了新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规训。从1946年8—9月以批判《星》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杂志为开端，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界开展批判运动。1947年，以对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哲学教科书《西欧哲学史》开展学术争论为名，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哲学批判。1948年，围绕歌剧《伟大的友谊》，对所谓“形式主义音乐”进行批判；在文学批评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运动；在遗传学领域，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进行批判，制造了苏联科学界的大冤案。1950年，在语言学领域展开了批判。1951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中展开了批判……

巴别尔、曼德施塔姆、古米廖夫、皮里尼亚克、

普拉东诺夫等著名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被镇压。为世人熟知的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普拉东诺夫、格林、格罗斯曼等作家和诗人被软禁、监视、流放。一些苏联作家、艺术家，终年生活在恐惧之中，终日战战兢兢。著名的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就说过：他时刻在等待被枪毙。

被誉为“革命海燕”、“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的高尔基的命运很能说明苏联政治生态环境。当高尔基在国外时，他能够畅所欲言，尖锐地抨击苏联。当他回到苏联之后，高尔基开始说一些“极合时宜的话”，颂扬苏联现实，吹捧斯大林。他曾在信中这样谈及他和斯大林的主仆关系：“没有机会……和主人谈，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到他那里去。”

苏联自然科学家的命运也是一样。1948年，生物学领域发生了官僚李森科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批判，给苏联的生物学、遗传学造成莫大的损害，几十年里，苏联的这一科学领域成为荒漠。

二

与20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政治环境相比，苏共新一代领导人赫鲁晓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使苏联的政治气候出现了“解冻”的气象，使无数苏联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不过，自身文化修养不高并且极愿表现自己的赫鲁晓夫对待知识分子也是粗暴生硬的。1962年，他在与文艺界知识分子的见面会上，讲了下面的故事，以便让知识分子知道天高地厚：一个上校和一个将军发生争论，上校说得全对，将军张口结舌。可是，恼怒的将军向上校发出命令：“向右转！开步走！”上校在将军面前只得服从，于是被赶出门去。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对眼前的文艺家们说：“你们就是上校，而我呢，对不起，是将军。”

作家格罗斯曼1962年写给赫鲁晓夫的信比较有代表性。由于他的小说描写了苏联的真实情况，杂志社不予发表；官僚们严厉地谴责他，责令他提交悔过书；有个官僚说，他的小说“要等到250年以后”才能发表。不仅如此，克格勃还上门搜查他的住所，没收了这部小说的手稿。万般无奈之下，格罗斯曼寄希望于开启了“解冻”的苏联最高领

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在信中倾诉自己的痛苦和不幸：

“……一年过去了，我多次深入思索发生在我的作家生涯中的这场悲剧，关于我的书的悲惨命运。我想跟您交流一下我的想法……把作品从我的手中夺走是可怕的。我对这部作品的珍视就像父亲对他们的亲生子女，把作品从我手中夺走犹如从父亲手中夺走他的孩子……我请求您把我的书还给我……”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著作不能出版、手稿被警察没收，就如同一个母亲被剥夺生育权、婴儿被强盗夺走。不过，与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那些作家相比，格罗斯曼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逮捕、没有被枪毙，只是被剥夺创作权、发表权而已。

当苏联历史迈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的宽松气氛消亡殆尽，“斯大林模式”悄然回归，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严苛。恰恰在这个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通过这些组织，“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

“持不同政见者”以“地下出版物”等方式与书报检查制度对抗。地下出版物包括一个庞大的地下编辑、印刷、发行和流通体系，它拥有固定的作者、编辑人员、印制人员、各地及国外的发行人员以及印刷、出版和发行资金的提供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在苏联非主流政治文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持不同政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持不同政见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等人的作品和著作都是通过“地下出版物”体系在国内秘密传播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也失去了言论自由，他晚年口述完成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是通过“地下出版物”渠道辗转流传到国外出版的，他因此受到苏联政府的指责，他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回忆录是假的。

苏联的统计显示，仅1967—1971年，苏联就出现了3096个“有政治危害性的团体”。在1959—1974年间，约6万公民曾被“预防警告”，其中近3000人的罪名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活动——典型的即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对“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压，除了逮捕、判刑等强力手段外，还采用解除公职、开除党籍、驱逐出国、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等措施。1969年，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提出扩大精神病院网的建议，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

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最先公开地、言辞激烈地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称之为“中世纪的余孽”，要求将之彻底废除。许多知识分子热烈地支持索尔仁尼琴，大约80名苏联作家随后联名给苏共中央去信，要求撤除书报检查。1974年2月12日，苏联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将其驱逐出境。

苏联后期除了“索尔仁尼琴事件”，还有“科里亚金事件”。科里亚金是苏联哈尔科夫精神科诊所的医生，由于他的揭露，全世界得以了解苏联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新手段：将之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宣布他“精神失常”，是“疯子”，在精神和肉体上施加折磨。

苏联政府以科里亚金“诽谤国家”“反苏宣传”为由将之关押，并进行审判。科里亚金事件始于1981年2月13日科里亚金被捕，止于1987年2月19日出狱。在6年时间里，科里亚金经历了审讯、判刑、服刑、绝食抗议，而他的种种遭遇都得到了西方医学组织及人权组织的关注，西方界对此或是呼吁，或是抗议。该事件造成较为重大的国际影响，苏联的国家形象因此而严重受损。

知识分子好比是苏联社会的毛细血管，血管阻塞，势必影响整个躯体的运行，进而危及生命；苏联社会最终出现“综合病症”，苏联最终走向衰亡，谁能说与其知识分子问题无关呢？

三

《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1936—1991）》凡40余万字。张建华教授在其封底郑重声明：“谨以此书纪念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以表达他对这场影响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进程的大革命的致敬。他还曾表示：回顾和研究苏联兴亡史对于“奉俄苏为师”并坚守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研究从来不是纯粹地抒发怀古之幽情；对张教授这一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笔者深深赞赏。

（责任编辑 新会新）